

第三节 不同的文化传承

1842~1860 年间，通过两次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了以《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标志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形成了束缚中国进步发展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正是这个不平等条约体系，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 年的《马关条约》和 1901 年的《辛丑条约》，把中国完全地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因此引发了中国民主爱国者的愤怒，从而发动的多次革命。可以说，在近代中国 109 年的历史中，由中国的革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些革命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谋求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谋求国家的民主进步。^[1] 反帝反封建，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家》在思想上便传承了这个历史发展主题，将高公馆这个封建家庭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代表来写，从中反映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与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本质规律。发生在高公馆老一代与新一代之间、老制度与新思想之间、主仆之间，以及封建家庭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

巴金在《家》中塑造了众多人物：有专横，衰老的高老太爷，荒淫残忍的“孔教头”冯乐山，腐化堕落的五老爷克定，善良却柔中有刚，敢以死与封建专制相抗的鸣凤，温顺驯良却抑郁的梅芬，善良厚道的瑞珏，以及受新潮思想、向往自由平等的觉慧、觉民、琴、许倩如等青年觉悟者和叛逆者等多达 70

[1] 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2006 年 03 月 10 日。

人左右，而且所写的事件也多，如学生罢课、梅与觉新的婚姻悲剧、鸣凤之死、觉民逃婚、瑞珏惨死、觉慧出走等等。

在作品中，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代表。他的专制、冷酷酿成了一桩桩悲剧的发生。看到了自己的儿辈荒淫无度，为了维持、发展“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他临终前不得不对孙辈表现出了慈祥、富有人情味的一面企图挽救即将崩溃的封建旧家庭。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将崩溃时期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觉新是一个接受过五四新思潮冲击但处于“长房长孙”的位置上的人，他接受了封建家庭的正统思想，常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但也对封建家庭的腐败不满，因此形成了明显的矛盾性格：在旧家庭中是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在觉慧、觉民等年轻人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青年。他的性格善良却又懦弱，他认为反抗是徒然。以致在“五四”新思潮中，他选择了“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这样复杂矛盾的性格造就了他悲剧的一生。

觉慧是受“五四”思想冲击的新生民主力量，大胆、幼稚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同情下层人，主张人格平等，与丫头鸣凤恋爱；反对觉新的“作揖主义”，鄙视克安、克定荒淫无耻的生活，追求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他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展现出了他坚定的民主信念及反抗的彻底性。

文中还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其中琴与许如倩都是受新思潮所影响的觉悟者形象。琴是富家小姐，亦生长在一个封建礼教家庭。但琴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封建礼教，她甚至看清了千百年中国女子所走的血路，一种渴望正义的感情在琴体内发生了，“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她了解了鸣凤的悲剧，领悟了梅和瑞珏的哀伤；她明白了不能企盼别人，应该自己拯救自己！琴和鸣凤一样看到了“宿命”，但她唾弃这个“宿命”！“我不

走那条路。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我不走那条路，我要走新的路，我要走新的路”。她和觉民为了爱情，为了理想，对封建婚姻制度坚持反抗，终于争取了自己的幸福。许情如同样出生于富家，是个大胆有个性的新女性，小时母亲去世，父亲对她的宽容，使她毫无顾忌的去追求民主自由。她时常与有思想青年一起，携助办《黎明时报》，发表进步言论，带头剪去长头发，并鼓励女生剪头发。

如此多的人物与复杂的情节，巴金采用了单纯明快地讲故事方式，每个故事都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但又与其它片段紧紧相连，环环相扣又互相牵制，以不同事件为线索，以事件中的场面串连故事，巧妙地把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各种矛盾纠葛，同新老两代矛盾冲突这条主线交织成一体，围绕作品的反封建的主题思想，有条不紊地展开叙述。巴金在讲述的过程中把个人主观的爱恨与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挚浓烈的情感构成了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使读者在领略人物性格时，似乎看到觉慧就是作者的本人；在故事的悲剧与新一代青年的反抗斗争中，让读者体会到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示出当时反封建运动的广泛影响。

然而《向前看》在结构上却与《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家》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而《向前看》主要的形象只有三人，加上次要的人物也不过七、八个人。《家》是以简单明快、环环相扣的讲故事方式进行叙事，《向前看》虽然也有叙事，情节却没有《家》的复杂，而且运用了大量的议论和说明来进行描写。追根到底，还是两国的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对文学史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了。

十九世纪中叶，两大邻国缅甸与中国在英国的侵略下均以一败涂地结束，使泰国上层统治集团深为震惊，领悟到古老的泰国，不能再原封不动地按古老的方式统治下去了。拉玛三世去世后，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权贵拥戴蒙固继

位，号称拉玛四世。从拉玛四世开始，贵族内部便开始推倡学习西方文化，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蒙固去世后，他的儿子朱拉隆功成为五世王。以朱拉隆功为代表的以王室成员为核心的、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素质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对泰国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了一次以西方行政体制为蓝本时代潮流改革，并开始建立平民学校，向欧洲各国派遣留学生。十九世纪末，拉玛五世继位后，开始对内政、体制进行改革。他兴办现代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出版泰文和外文报刊，自己也出访欧洲，因此，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涌进了泰国。拉玛六世时期(1910- 1925)，赴欧洲留学的泰国学生带回了许多新思想。西方文化与文学作品的大量涌入，使泰国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2 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的前夕，泰国文坛上便出现了一批倾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青年作家。他们受西方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等人的影响，努力打破传统的旧形式，摒弃以王公贵族的生活为题材的传统，直接取材于生活，着重反映现实，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泰国社会新思想与旧思想、新一代与老一代、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表达自己明确的思想倾向与政治理想。《向前看》便是传承了这一时代主题。因此，便造成了《向前看》与《家》展示的不同之处。西巫拉帕运用了大量的议论和说明，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泰国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把自身明确的民主思想倾向表达得淋漓尽致。

作者用议论和对比说明，通过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詹陀的眼睛来反映 1932 年政变之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在詹陀原来生活的农村世界里，人们过着谦虚谨慎俭朴的生活，靠自己的力量生产日常所需，人们能够享用自己参与创造的东西；他们之间没有竞争，没有欺压和破坏，也不存在诡诈狡猾，玩弄计谋之事，更没有主人和奴隶、性别之间的欺凌压迫。尽管如此，他们仍逃避不了天灾人祸，在环境与统治者的压迫下过着艰难困窘的生活。“他们无法战

胜大自然，或从大自然奴隶状态中自我解放出来。畏惧之心在他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正是这种对冥冥之中的力量屈服的心理，使他们害怕那些他们认为是比自己有权力、文明和聪明的人。”^[1] “他们的生活所反映的是下贱、落后和愚蠢。这是命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如果他们想获得较好的生活或像文明的京城人那样舒适方便地生活，唯一的途径是通过行善积德。”可是“天堂”里，人们不是靠自己劳动来取得日常所需，尽管东西样样俱全，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甚至有些人连自己的劳动也得不到报酬；在公馆里，主人们出入扈从簇拥，不用劳动而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表面冠冕堂皇，讲求优良风尚，但内部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按照常情，人们获得爱或憎，是根源于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个规律对于来到大厦之后的詹陀却行不通，因为他并无过失，未给人造成麻烦，然而，却无端遭到某些人的憎恶。”奴仆们在封建等级观念的毒害下竟暗分等级，彼此嫉妒欺压，相互陷害。从这一系列的议论描写，把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与封建等级制度的丑陋面目作为对比，写出了劳动人民与贵族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腐朽提出抨击。

“这种巨大的变革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地，并以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之势，涌进了亚洲和非洲，唤醒了那些翘首遥望着变革浪潮的世人”，面对新革命的到来与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在新思想的冲击下，新一代和老一代产生了不同的分歧。沉迷于泰国古老的封建信念中的老一代，^[2] “认为人生的苦乐皆由天地神明安排，不是人力能够随意改变的”，仍然奢望封建统治者的神威定能将他们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另一部分守旧的人也“认为眼前产生的，固然是天命所使然，但依靠那些历代相传、统治暹罗已经好几代人的国王和王公贵族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52页

[2]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140页

的神威，定能同紧紧地攫住他们受苦受难的生命锐利之爪作斗争，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战胜它”；而新一代则“不愿接受这种古老的信念，通过对形势的研究和对新思想的学习，通过发生在他们周围的种种事实观察，通过对他们亲眼见到的和从书本上所获知的事物的比较，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开始“对统治着自己的官僚政府的统治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并认为理应有变革。政变发生后，各阶层人物表现出了不同的情绪：旧势力惶恐不安，幻想着革命得到镇压，奢望他们的荣华富贵能一往如旧的延伸下去；豪商巨富们则趋炎附势，等待着从中获利的机会；贫苦大众从政变党揭露官僚政府的黑暗中看到了新生活的光明，并对民主充满了信仰和期望；资产阶级分子则热情地投向到新运动的浪潮中去，为泰国光明的未来奋斗。

政变后不久，新政党内部出现了必然的分歧：“用民主制度来代替君主专政的人民党政府，成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以后，努力使这个新机器按照爱国的美好愿望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对革命的理想缺乏坚定的信念，缺乏为实现革命的目的而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措施，这种爱国的美好愿望便逐渐减弱下去；加上在当权的宝座上坐久了以后，一种自私的、为个人的前途、名利和地位打算的思想就在这个党的一部分人的心里滋长起来，逐渐把原有的爱国思想排挤了出去。另外，由于已经对势力集团进行了一次镇压，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碍它为所欲为了，于是政府便愈来愈滥用权力，并且终于进行了一次对所谓政府的敌人的大逮捕”这一系列的说明，把政变后军人独裁政府的丑恶面目揭露得彻底无遗。

作者通过大量的议论说明，通过对比与讲述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制独裁，要求自由民主，把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劳动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展示出来。作品的亮点集中在了“民主”这个概念上，进一步体现出了作家自身明确坚定的民主思想倾向。

第四节 表现手法的不同

许多人都认为，巴金写《家》的时候模仿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本人也有所认同，虽然巴金先生自己曾经说过，他受左拉、屠格涅夫等西方作家的影响很大，但在表现手法上，《家》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特色，擅长叙述，突出注重情节，通过故事情节表现人物。巴金将人物形象置身于特定的背景中，故事讲得生动、深挚，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展示个性色彩，与《红楼梦》可以说是同出一辙。

《家》除了描写学生运动和兵变作为背景外，主要讲了三个青年的恋爱故事，把三个故事编织起来，进行巧妙的穿插，使全篇藕断丝连地发展下去，构成特有的风格。作者非常善于描写人物的语言动作，以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而展示人物个性。

书中在提到觉慧与鸣凤的爱情时，有觉慧爬上树帮鸣凤折梅花这一段情景。鸣凤“在下面叫：‘三少爷，当心点，当心点！’”，当觉慧折完梅花，鸣凤“忽然注意到他把衣服披在身上，并不穿好它，便关心地说：‘你快把衣服穿好，等一会儿会着凉的。’”当她转身时走时，觉慧叫了一声，“她转过身，站住了，带笑地问：‘你喊我做什么？’她看见他不说话，只顾含笑地望着她，便又掉转身子向前走了。”觉慧又喊了她几声，“她又站住，掉转过身子依旧那一句话：‘做什么？’”从“当心”“一会儿会着凉”这两句话来看，可以看出鸣凤内心对觉慧有着浓厚的感情，她连续转了三次身，重复地问“你喊我做什么？”更能看出她渴望觉慧的爱，但她的内心还是在犹豫不决地挣扎，以至于做出“冷淡”的样子说出“你是少爷，我是丫头，我怎么敢跟你多说话”这样的话来。面对着爱情，鸣凤简单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把她渴望爱情却又有作为奴仆所俱有的强烈的自卑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又把她纯洁、软弱的性

格真实地表现了出来。

觉慧在书中是一个热血的封建“叛徒”形象，在闹学潮事件中，他听说士兵打学生后，^[1] “不由自主地掉转身，回头跟着张惠如走。他浑身发热，咬着嘴唇皮，等候张惠如讲话。”^[2] “他用手按住胸膛，他觉得怒火直往上冒，他的胸膛好像快要炸裂似的。”在督军府前，他^[3] “也在人丛中拼命地拍掌。雨点不停地落在他的未戴帽子的头上，把他的头发打湿了。他不时用手护着眼睛，或者用手腕遮住前额，但是他的眼睛仍然看不清楚旁边同学们的脸部表情。他看得见兵士们的刺刀，看得见督军署门前的两个大灯笼。他看见广场上无数黑压压的人头在动。他没法压下他的愤怒。他只想大声叫一阵，他觉得自己快要憋得透不过气来了。”从“掉转身”“咬着嘴皮”“按”“冒”这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出觉慧对士兵打学生这种不民主行为的愤怒与投身民主活动的热情，由此体现出他正直无畏的性格特点。他直言鼓励觉民对抗高老太爷包办婚姻的命令，敢于理直气壮地嘲讽高公馆里的“捉鬼”事件，从他坚定的神情与愤怒的语气中，再一次展现了他叛逆而正直的个性。

而谈到觉新的矛盾性格，在文中一开始就能体现出来了。面对着自己的婚姻大事，^[4] 当父亲让他定亲时，“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顺从父亲的话。可是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了了的幻梦而哭。”^[5] “他绝望地痛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着头痛哭。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

[1]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50页
[2]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51页
[3]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54页
[4]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31页
[5]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32页

所爱的少女痛哭。”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1] “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南京两地六月初大罢市的新闻。^[2] “……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地读着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3] “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4] “觉慧说到那期《新青年》杂志少时，他不在意的答应了一句‘我已经对陈老板嘱咐过了，要他每次新书寄到，无论如何先给我留一本。’”从觉新关心新报刊的行为、唯唯诺诺的又充满哀怨的动作言语中，能够看出他是受新思想启发对现实有极大的不满，却受旧思想所束缚而无力挣脱，他内心的苦闷与矛盾，便他的复杂的双重性格真实而形象展示出来。

除此之外，在塑造梅、瑞玉等人物时，也非常注重用相应的动作与表情描写来刻画人物的个性。面对悲剧性的婚姻，梅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全都是充满了忧伤，使梅多愁善感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瑞玉的温柔体贴与善解人意的言语举动中，可以看见她贤淑乖巧的性格，但在面对困难时的愁容也看出她与梅、鸣凤有所相似的软弱个性。

巴金把这些人物放置于特定的故事背景中，通过动作语言的细致描写，流露出真挚浓烈的情感，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激情，把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得生动贴切，把各自不同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不同于《家》的是，《向前看》吸收了西方小说的特点，以大段细腻的白描来表现主人公丰富而又奔腾的内心世界，突出了人物的主观感受和精神探索，展示个性色彩。

[1]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6 页

[2]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7 页

[3]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7 页

[4]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9 页

文中在描写詹铎初次上学校的情景，“从离开叻察他尼公馆坐上汽车起，詹铎·农彝令的心就七上八下地跳动着，他拘束地坐在司机的身旁，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看上去像是坐在褐色奥贝乐牌汽车后座上的那个眉目清秀肤色白嫩的学生带的玩偶”“玩偶第一次挪动身子，但双手还是交叉放在膝盖上。”

“听到变速器声或看见车向前飞驰时，他又坐得笔直，心比原先跳得更厉害。当他看见前面那上端尖锐的粉红色铁栅时，脸色都吓白了。”这一段描写，不加修饰地把詹铎初次坐上车上学校的情形勾勒了出来，从他的神情和动作，层面上是刻画了一个农村的苦孩子初次接触大世界那种恐慌、不安的心理，实际上也反映出了他作为“乌鸦”所具有的那种朴实又带有“安分守己”的性格特征。在写到尼塔反驳鲁吉勒的祖先是英雄后，鲁吉勒发怒正要对付尼塔动手，

“同学们都吓得惊惶失措，担心尼塔会的脑袋会被撞破。但是，正在鲁吉勒想这样做的时候，詹铎用力挥动左手的粗厚手掌，顶住了鲁吉勒的脸。这个当运动员的男孩咆哮着，向詹铎狠狠扑过去，好像一只中弹的猛虎。但是，猛虎还没有扑住他的食物，詹铎的右拳又在鲁吉勒的脸上敲了一下。只见这只猛虎打了个趔趄，便倒了下去，仰靠在桌子上，一动也不能动了。詹铎没想到他的拳头有那么大的力气。但是，即使是他估计得不对，他也清楚地知道，他的拳头的力量产生于他对自己的好友的安全的关怀，保护朋友朋友远比保护自己重要，所以拳头打出去才格外有力。”从作品的开头可以看出詹铎平时是一个朴实又“安份守己”的人，但后来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而毫不犹豫地当运动员的鲁吉勒挥动了拳头。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是为了保护朋友的安全，但实际上他从内心里认为尼塔所说的对他来说都是事实，是真理，他的挥拳最终是为了保护事实与真理而显得格外有力。这又把他勇敢、正义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作品中，詹铎是一个矛盾体，他热爱真理渴望自由，但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又一直受着权贵的庇护，所以对封建制度有着敬畏的情感，因此在

面对新思想与旧制度的许多时候，他的内心都是犹豫不决的。但在自身的生活体验与学习中，加上朋友、老师的引导下，他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与必然性，最终坚定的走向了追求民族自由的道路。

另外，作品写到阿诚在报导外国新闻工作时，通过阿诚对国际形势的关心，对人类生命的重视和真理的执着，并不向权势低头，把他内心对和平的热爱与对社会的忧虑细腻地呈现出来。“听到纳粹头子把脚踩到奥地利国土上，他的心和奥地利人一样感到痛楚。虽然他非常热爱和平，他也还是认为英国和法国对邪恶势力的妥协，承认纳粹头子对一个无辜国家的掠夺，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一九三九年三月，纳粹匪徒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占领了捷克全部领土，这时他内心的痛苦不下于每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纳粹头子的背信弃义，加上两个强国没有履行自己对捷克国家的独立所作出的保证，使他对所有列强政治家的道德品质都失去了信任；而听到那些纳粹豺狼最后像一群寡廉鲜耻的赤裸裸的强盗像闯进邻居家那样侵入满目波兰国土的时候，他的心也几乎同时要碎了”，这一段描写，写出了阿诚内心对不人道的痛恨与对受侵略的人们的深切同情，从对外国国情的关注与关心，进一步表现出了他善良、正直、坚毅的性格，刻画得形象逼真。

文中还提到了詹铎曾深爱过的芭琅，尽管芭琅也爱着詹铎，但在詹铎向她表白后，她却拒绝了詹铎，理由是她憎恨乡下的生活，“不管是好是歹，死也要死在曼谷这个地方。”并以“女人靠的是丈夫，好歹就看年轻时”作为她的人生哲理。后来再与詹铎相遇时，“芭琅谈到她和她的少爷同居的一年里，生活是过得那么的惬意。瓦拉查给她租了一座相当舒适的房子，让她过着太太般的生活，给她雇了一个女仆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仆。她唯一的任务就是尽力服侍他，让他快乐。自己也感到幸福，她完全沉醉于这种新的生活之中。她对这位来自农村的朋友说，她过着这样的生活，自己感觉到就像在天堂里一般，只

不过这种天堂般的生活只过了一年而已。”作者则通过芭琅过着贵族情人生活的描写来揭露她内心深处对贫穷的恐惧与对贵族生活的崇拜与向往，把在封建等级制度的毒害下的芭琅对农村生活的悲观失意与爱慕虚荣的性格彻底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大段的白描，有意识地在角色和读者之间制造感觉上的距离，使读者用探讨、批判的态度去看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浓墨重彩，也没有华丽的陪衬，朴实简练的语言，把人物各种内心活动与思想矛盾真实地在读者的印象中形成一幅清晰的画面，从而展现人物多姿多彩的个性特征。



第三章 《家》与《向前看》的比较基础

第一节 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通过第一章比较《家》与《向前看》的类似点，我们可以发现，《家》与《向前看》所诞生时的社会背景非常之相似，它们都产生于两国内忧外患的时期，都面临政府内部腐败无能的统治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剥削，从而迎来历史转折性的改革时期。

清朝末期，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塌了中国清政府闭关自守的门户，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与懦弱，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统治，也使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腐朽暴露无遗。抵御外侮成了当时中国变革的启动因素，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由开始的社会改良激变为社会革命，使变法图强、革旧自新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旋律。到了五四时期，这一主题更为突出显著。五四运动高举着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及其文化思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从而推进了中国的旧民主向新民主阶段发展。而同一时期的泰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炮轰的威胁下，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向西方列强打开紧闭的门户，并成为帝国主义掠夺泰国的社会支柱。泰国虽然名义保住了独立的地位，但在经济上却沦为了半殖民社会。泰国的封建官僚在局势的威迫下，开始对内政、体制进行改革。他们兴办现代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出版泰文和外文报刊，并经常出访欧洲，因此，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涌进了泰国，民主主义开始在泰国传播。到了二十世纪初，在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压迫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泰国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对局势的控制无能为力。封建君主专制的腐朽日趋暴露，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的逐渐成熟，引发了一九三二年的“六、二四”政变，促使泰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

从中泰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放眼亚洲各国，当时的亚洲社会正面临着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期。自 19 世纪中叶起，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加剧侵略扩张，开始直接占领亚非拉地区，亚洲遭到的殖民灾难更为严重，许多国家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但也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迅速地渗入亚洲各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亚洲许多国家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独立运动，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摆脱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并由此发起了各自的改革运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亚洲各国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然而，帝国主义和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矛盾，是这个时期亚洲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要想争取民族独立，改变殖民地的地位，只有冲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与压迫，发展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才能达到民主改革的目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担起领导各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任，他们勇敢、坚定地与旧权威发起斗争，从而引起了亚洲民族民主运动高涨。其中包括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伊朗和土耳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朝鲜的人民的反日斗争；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越南、朝鲜、印尼也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1] 列宁 1913 年 5 月 7 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里称之为“亚洲的觉醒”，对这场新的革命风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二十世纪初的亚洲革命风暴标志着亚洲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个国家所发生的变革都是正在蓬勃发展的整个亚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亚洲各国人民在被压迫、被侵略后勇敢地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武器，向着帝国主义、东方专制主义进行英勇的对抗。

[1] 刘长青，亚洲觉醒的内容与特点，[J]，1994

第二节 不同的历史使命

尽管中泰两国在同时期内存在着相似的社会背景，但从第二章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主题思想、结构与表现手法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一个是为了反映中国封建社会黑暗的过去，从而鼓励人们走出封建的桎梏；一个是为了展现泰国民主光明的未来，从而鼓励人们共同为民主作出努力。追根到底，正是由于两国的作家背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才导致有此差异。

清朝末期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击下，清军节节败退。这使中国资产阶级分子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腐朽，下定了以暴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决心。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孙中山建立兴中会，打着“民主与共和”的口号发动了辛亥革命，反对君主立宪制，坚决彻底推翻了两千多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普遍为清帝退位大喜过望，以为民主制度就此确立。但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其封建思想文化根深蒂固。辛亥革命后，保皇势力沉渣泛起，讨袁袁军失败，二次复辟闹剧，大小军阀纷争，都表明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可能导向民主政治制度，旧民主革命由此到了穷途末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在西方近代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五四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到了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打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掀起了五四新民主运动热潮。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民主与科学的一席之地，这便与西方国家的现代文化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正是这种落差，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更使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轰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专制政权，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革命的首

要任务，因此反封建的旗帜更突出。这一点在《家》与《向前看》的差异中我们已经初步提起过。五四是呼唤民主的政治运动，也是推进新文化的运动，五四青年必然担起反对封建专政的政治与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使命，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因此在诞生于五四时期的《家》锋芒都集中指向了反帝反封建这一点上。

而不同于中国的是，到 20 世纪 30 年代，暹罗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国内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以国王和王族为首的封建贵族统治集团表示出不满，要求改变专横、专制的统治方式，甚至有的党派受到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思想影响，号召在暹罗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一九三二年政变后，由于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它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因此封建因素仍保留了许多。另外，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以新的剥削制度来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夺取政权就代表革命的结束，而不可能做到彻底消灭一切旧制度。正因为如此，泰国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成为现实，在《向前看》中反应出以下几点：^[1] 一、生存权尚未获得保障：泰国国内存在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不均问题，泰国农村地区大部分下层人民仍在贫困和灾难中挣扎。在这种情况下，贫困的下层民众根本没有能力主动参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二、教育水平偏低：泰国教育水平的偏低，使不具备相当文化水平的普通民众不能确切地理解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更无法透彻地了解当前的民主政治体制赋予自身的民主政治权利，以及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通过行政或司法的途径寻求有效保护，将其拒之民主政治的门外。三、传统道德文化的束缚：尽管泰国在政变后成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其传统社会结构仍保留至今，传统道德文化更是仍盛行于世。

[1] 周方治，泰国民主政治：现状与问题，[J]，当代亚太，2003 年 6 月

泰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内涵可以借用其“国家、国王、宗教”神圣立国三原则来概括，而这三者却全都是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传播的严重障碍。前两者与民主的抵触不言而喻，至于宗教则是佛教理论如“前世业报轮回”等仍与民主思想的“平等”相违背，佛教要求的克己忍让以修来世的消极处世观又与民主思想倡导的积极进取、适者生存的积极处世观相冲突。在这场传统道德文化占绝对优势的斗争中，使泰国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传播举步维艰。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仍落在青年一代的身上，积极投身人民民主运动便成了时代赋予泰国新青年的历史使命，这在《向前看》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以上扩展开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亚洲多国间由于文化结构不同，国情社会不同，导致出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的不同，因此也造成了巴金在写《家》与西巫拉帕写《向前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第三节 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的对比研究，我们看到中泰两国存在的相似与差异，使中泰文化交流成为了可能。

^[1] 首先，两国人民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具有许多共通之处，并互相渗透，相互影响着。由于中泰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移居泰国的华人非常之多，并带着华人文化融入了泰国文化之中，保持着尊敬长者、尊崇祖先、庆祝华人节日等传统。同时泰国文化也对中国东南地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小乘佛教就是通过泰国传入云南部分地区的，云南傣族的佛塔与泰国的佛塔是一脉相承；云南傣族人民的“泼水节”与泰国人民的“宋干节”

[1] 孔淑红，中泰社会文化关系 [J]，东南亚研究，1996年3月。

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两国关系中内容丰富的一页。

其次，泰中两国在发展现代科技与教育、文化各方面都面临着相似的局面，尽管两国在这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但仍存在着基础薄弱，教育水平偏低，缺乏高素质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等问题，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交流，有利于共同研究并解决所面临的这些困难。

另外，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文化交流方面及经济、贸易方面，中泰两国人民都在进行大量的工作，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合作，并将这种规模不断扩大，使中泰两国在文化、经济、教育合作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

最重要的是，中泰两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很相近，近代的中泰两国都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强国，而是处于相对落后的弱国地位。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便逐渐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直受到强国的掠夺和分割，而实际上泰国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二战以后，两国分别踏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目标和起点都很一致。两国都是从落后的农业国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目标都是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在国际、国内事务中，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语言。尽管两国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文化传承有所不同，但悠久的交往历史积淀下来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境况和面临的挑战，通过两国文化交流，给两国的相互合作、互相借鉴展开了广阔的前景。

综上所述，本文以为，通过《家》与《向前看》的比较研究，既可以让泰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为反封建付出的努力，也可以让中国人民认识泰国人民在上个世纪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所作出的不屈不挠的斗

争，进一步促进中泰文化之间的交流，使两国人民增进彼此之间的认识与友谊，谱写出中泰友好关系史新的篇章。

